

##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形象的重塑特征

董在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省青岛市, 266580)

**摘要:**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重要开端时期, 其间出现了对国外文学著作大规模翻译的盛况, 译者们以中国的文化政治语境从西方窗口中建构了适合当时中国读者接受的大量西方人形象, 其中鲜明的翻译目的和意图已经远远超越了文本的层面。面对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通过将交叉译介学和形象学相关领域, 考察特定时代多部翻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把握概括其中共性, 揣摩译者意图, 从寄寓民族情感与意图, 补全人物轮廓, 增加人情味, 将人物置入中国道德框架下三个方面浅谈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西方人形象的改写特征。

**关键词:** 清末民初; 形象重塑; 民族意图; 补全化; 道德框架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形象学与翻译学是比较文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历来受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但在 19 世纪末确是这些研究方兴未艾的阶段, 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来说也是陌生又熟悉的。大批诸如“福尔摩斯”“尼摩船长”“鲁滨逊”等形象走向我们, 他们像我们介绍异域风貌, 让一束强光射进封闭的中国, 大量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译者, 将众多西方小说人物请来, 或为他们着长袍, 或为他们穿马褂, 或为他们留辫, 或为他们蓄须, 纳入中国文化语境中再见国人。虽然说形象发生了改动, 但对读者来说却是高效接受之法。那么, 译者们对于诸多人物的创造性叛逆又有哪些特征? 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笔者有以下观点:

### 一、寄寓民族情感与意图

清末民初是几千年来中国初次大规模集中性与西方接触的历史时期, 列强侵略, 山河破碎, 沦为他国宰割的对象, 中国人天朝迷梦破碎随之惊醒, 被迫接受了自我文化守旧落后, 他者文化新兴先进的现实,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一改“夷人”“鬼子”“红毛番”的套话, 重新审视了西方人形象, 同时态度中掺有复杂的学习欲望和自强愿望。而此时几乎每个译者都有意无意地将民族情感或意图注入其中译作人物身上, 期望使“他们”连同文本能在风起云涌中尽救亡图存的绵薄之力。

首先是译者意欲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来推介异域文明, 启蒙旧邦民智。清末民初的中国加速融入世界, 运动、变法、新政, 波折反复, 中国人的思想与制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先进知识分子眼界大开, 搁置偏狭目光, 改换崇尚心态, 主动担负起了改良思想, 开拓民众视野的重任, 但囿于身份处境, 民众封闭固陋等现状, 撰写文章, 介绍传达新事无疑是一个最便宜的方法。

他们在译作中展示外国风貌: 技术、制度、文化, 以作品中人物的脚走到国人新奇的角落, 让异域文明的戏唱到中国舞台。译作中人物身上的品格、气质等更是译者想要树立的榜样, 于是形成了以福尔摩斯等为引介人的制度介绍, 以福格等为引介人的技术介绍, 以及

诸多作品均有涉及的文化介绍。西方世界完善的法律、司法、警察、监狱系统，民主政治制度，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无不是以译者需要，以人物口眼展示出来的，其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改写意图自然也是十分明显的。薛绍徽、陈寿彭<sup>1</sup>夫妇二人让“原文中沉默寡言的福格在译文中对不‘好游者’慷慨言道：‘安得亲历大地，以畅吾游，以快吾志，以破彼辈之聋瞶固陋也。’”<sup>2</sup>梁启超编译《三杰传》<sup>3</sup>将意大利在三杰的带领下获得民族独立，走上国家富强之路的图景铺开，“求其爱国者之所至所事，可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sup>4</sup>这种语境中的唤醒意味之浓厚可以想见，未出刀枪而补救文明，少费口舌而改良思想，原作人物身上细微的启蒙色彩被渲染放大以适用于译者目的，更满足了当时国家国人认知世界，融入世界的迫切需求。

其次，译作人物身上有译者鼓励国民英气，呼吁英雄出现的愿望。在当时的翻译小说中，无论是科学小说、冒险小说，还是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均无例外地在其中塑造典型英雄形象，如关怀支持世界反暴政行为，对未知世界英勇无畏的探索者尼摩船长，“侠义”心肠，扬善惩恶，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大胆英勇，征服外部世界的冒险者鲁滨逊，等等。这一集体想象物在中国文学中的数量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在当时中国的现实社会来说却是缺位的，或许这也是译者翻译过程中观察到的民族国家兴衰的症结所在。“国权与英雄是这一历史时期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的两个概念，要恢复国权，必须呼唤英雄出现，而英雄则是带着时代烙印、具有国家意识的现代民族英雄。”<sup>5</sup>于是译者抛弃难于使国人在语境障碍中理解的直接引入法，让创造性叛逆在英雄主义与民族意图的传达体会中凸显其角色重要性。

《前本经国美谈新戏》<sup>6</sup>将《经国美谈》<sup>7</sup>中独立主权与民主政治交织的故事改编成恢复国家主权为主的的故事，淡化了民主政治情节，比较当时中国亟待救国保种，独立为先，民主再论的国情，这种改写原因是明晰的，同时又塑造了齐武、安知本<sup>8</sup>等志士仁人为国家独立前赴后继的形象来激发国人，叩问时代，呼吁中国式齐武出现，改文本为现实。

鲁滨逊本是一个酷爱航海冒险的人，他不安于现状，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可以直白地说是为了追求金钱，这里也符合英国18世纪重商主义、经济个人主义的主流价值，但在《鲁宾孙漂流记》中主人翁冒险航海的目的却被改写成了“我生平以爱群为志，凡有益于国

<sup>1</sup> 薛绍徽，著名女文人、女翻译家。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外交官陈寿彭妻。陈寿彭，字逸如，近代史上著名外交家、翻译家陈季同之弟。福建侯官（现属福州市）人氏，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夫妇合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成为凡尔纳科幻小说最早的中译者，夫妇又合作翻译了《外国列女传》，最早且最有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西方妇女的著作。

<sup>2</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109页，原文引自《梁启超文集》。

<sup>3</sup> 1902年6月至12月连载于《新民丛报》，编译主要参考《伊太利三杰》和《近代世界十伟人》。

<sup>4</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179页，原文引自《梁启超文集》。

<sup>5</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175页。

<sup>6</sup> 作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改编自《经国美谈前编》，发表在《世界繁荣报》上。

<sup>7</sup> 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小说，1883年问世，日本矢野龙溪所著。

<sup>8</sup> 原作《经国美谈》中的一个小人物，被捕后叛变，《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被形塑为不肯变节的英雄。

民之事，即把我这斗大的头颅送他，也是甘愿的”<sup>1</sup>“吾虽少年，然至有胸襟，欲纵览世界”<sup>2</sup>，“把原文中的冒险天性与经济利益驱动转换为尽到为国家、为社会的义务”<sup>3</sup>，这样，一个为国为民，渴望知识而远行的无利益性的革命青年人物就建构起来，希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潜台词和冒险克难的精神浸透能够起到兴国人英气，挽中国颓然的作用。

或说一例二例尚不可证明问题，但翻译小说中译者为达到唤醒民智，鼓励国人，呼吁英雄目的的创造性叛逆实乃冰山，列举的只是其一角。译者家国情怀在译作人物身上的呈现，已经成为了译者不谋而合的集体意识，或潜在或明晰地在文本与时代间寻找民族情绪意图的寄托，正是他们力之所能及。

## 二、补全人物轮廓，增加人情味

大凡小说之作，所塑造的形象均有不完美性，作者如上帝一般创造着人物优劣长短，诠释着“人物”之为“人”，小说在流传翻译中的改写对于文本中的形象来说无疑是又多了一个“上帝”。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在翻译过程中对人物形象重新进行了审视，经过语境加工，对人物便做了补全性的“创造”，增加了中国人看重的人情味道。

福尔摩斯这一形象在原作上游走于法律内外，对官方、警察持冷漠的态度，不在体制之内，甚至嘲讽鄙视警察，这是他的一个鲜明个性。另一方面，福尔摩斯具有吸毒（注射可卡因）的怪癖好，面对挚友华生的劝阻无动于衷，甚至让华生也来试试。性格孤傲，爱好怪异这两方面明显的缺点在柯南·道尔的笔下是现实存在的，原作者并没有回避。而到了译者这另一上帝这里，情况便发生了转变，刘半农、常觉、陆小蝶等翻译家在缓和大侦探与警察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刘半农翻译的《四签名》中有“三处改译均使福尔摩斯在警察面前显得小心翼翼”<sup>4</sup>“警察琼斯对福尔摩斯的嘲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客气和谦逊”<sup>5</sup>，常觉、陆小蝶合译的《弑父案》中增删多次，甚至是剧情需要的冲突中也减少其两种身份的硝烟味。在吸毒怪癖问题上，译者们更是讳莫如深的，吸毒与当时敏感的鸦片很自然地能够联系在一起，处理时必须谨慎。于是译者为福撰申辩话语：“但以体既羸弱，非此殆不能振刷神绪”，“辄注射‘哥加因’，以消无聊之时刻”。吸毒的情节有删有减，终究是有的，但这样的申辩反而使福之形象无损而有其道理。

类似的例子还出现在福格、尼摩、鲁滨逊等形象身上，译者的叛逆创造使得人物趋于合理化和完美化，补全了中国人心中的西方人形象，而自己充当着辩护律师的角色。

<sup>1</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225页，原文引自《大陆报》第1期，第4页。

<sup>2</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225页，原文引自《大陆报》第4期，第20页。

<sup>3</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218页，原文引自《大陆报》第1期，第2-3页。

<sup>4</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42页。

<sup>5</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43页。

中国人特别在意“人情味”这一社会关系概念，更喜欢与有人情味的人接触，在文学接受上也不例外，换言之，便是不偏爱纯理性的人物，于是，以近代国人为接受主体的翻译小说就朝着这个方向创作起来。

福尔摩斯严谨公正的侦探身份与其孤僻、冷漠的性格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相互作用已经注定了福是一个极理性的人物，面对法律与良心的矛盾，毅然选择前者，排斥女人、朋友，对家人只字不提，不近人情，俨然一台法律机器。译者自然是不接受的，他们的创造性叛逆使得福的形象软弱温热起来，面对人情和法律，在不改变结果的情况下加入迟疑和思考，在摆明怪异性格、好恶时也阐释原由，孤僻无情是因曾有情，友情、爱情、亲情这些情感的丧失才使得它变成了这般模样。这些翻译解释已为文本加入了合理性，也让读者为这个为情所伤的人物产生怜悯同情之心。同样的，尼摩（李梦）船长的矜持、高傲神秘在李梦身上被消解，多了对友情的把握珍惜，对其他生命的尊重，等等。其他译者也对人物理性的方面大加新解，西方理性与东方感性的视域融合使得翻译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立体鲜活。

### 三、将人物置入中国道德框架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虽然是接触到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潮，但大部分仍处于中国传统道德的框架之内，文学译介活动也在其中游走，未能使西方人物逃脱东方道德的“约束”，忠义孝等传统概念加之于西人新事却不突兀怪异，足以看出译者用力之深。

“忠”这一道德元素可以表现为爱国和忠心，福尔摩斯“虽犯法，然而为谋必忠”<sup>1</sup>的开拓表述将自己置入高于“法”之道德话语中，《海底两万里》中欧露世（阿罗纳克斯教授）“名扬当世，国家与有其光”<sup>2</sup>的言辞以及在旅途中对国家念念不忘的行为与原作人物追求学问而旅行的观念大相径庭，这些都是“忠”之爱国含义的表现。另一方面，“忠心忠诚”在黑奴形象上得以刻画出来，译者将汤姆一个基督式的爱世人的形象加持于忠臣义仆的模式中，以报恩于主人的方式展开主线故事，浓厚的中国道德占据了宗教信仰的位置。同样有“义”存在的还有福尔摩斯的急公好义，不慕名利，拒绝报酬的君子形象，这些细节都是叛逆于原作者创作意图的。

值得单独提出的是译者对“孝”关系情节的设计。《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与父亲关系十分不融洽，背弃父命，离家出走，冷淡亲人，但在林纾<sup>3</sup>译本中却使鲁宾孙成了一个孝子，为国而弃亲，译者让其饱受抉择之苦，无奈忍痛离家，荒岛生活中也加强父母儿子双向的思念，杜撰“授余二亲”的财产遗嘱等，这种大规模、颠覆性的安排已经不是前文所述的增加人情味的性格补全，而是对中国道德语境的刻意嵌套迎合，这一点在改写鲁母，设定母慈子孝关系上更加得到明晰印证。

<sup>1</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56页，原文引自《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第九册，第6页。

<sup>2</sup> 刘小刚：《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第56页，原文引自《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第九册，第134页。

<sup>3</sup> 林纾，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对于文本解读传播的利弊有待讨论，但是这种文化声音的碰撞与协商，形象学与译介学的对话与交叉，译者对读者接受态度的思考和揣摩，使得作品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那种文化相对弱势的时代状况下寻找自我身份与文化语境的建构是难能可贵的，译者们对形象重塑的特征为语境对形象的影响，理论学科交叉研究所的成果的创造性以及当今时代自我文化的保护提供了一些答案。

### 参考文献

- [1] 陈向红. 晚清科学小说的政治化改写与人物形象的变形[J]. 名作欣赏. 2016(15).
- [2] 柯南·道尔著, 贾文浩, 贾文渊译.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M].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 [3] 孟华. 《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 [4] 梁启超. 《梁启超文集》[M].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 [5] 笛福著, 马静译. 《鲁滨逊漂流记》[M].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 [6] 刘小刚. 《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The Remolding features of Images in Translated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ONG Zai—qua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Abstract:** Intersection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mportant beginning period, during which appeared on foreign large-scal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translators in China'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window from the west to construct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readers to accept a lot of westerner image, distinct translation purpose and intention of them have far surpassed the level of text. In the face of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this paper will cross translation and imagology related fields,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 images in many translated novels of a specific era, grasp and summarize the commonalities, and figure out the translator's intention,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motion and intention, complete the outline of the character, increase the human touch. On the re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images in translated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mage remodeling; National intention; Completion; Ethical framework

**作者简介:**董在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